

方性和局限性,而且也又一次证明当今修辞写作研究必须走出自设的象牙塔,探索未知,超越自我。

毛履鸣教授主要从事西方修辞史、比较修辞、中国修辞、写作理论等教学与研究。近年来,为中国古代阴阳修辞的生成力(generative power)所吸引。文章认为,阴阳修辞和中国修辞实践可以为我们对极性(polarity)、对立(opposites)和二元概念(binary concepts)等重要理念重新界定所服务,其论文是这种观点的具体体现,也可以看成是从事比较修辞研究的一个可行模式。对立术语(terms of opposites)及其蕴含的分层极性(hierarchical polarity)和价值判断长期主宰着我们的思想和实践,面对这样的现状,文章借鉴中国的阴阳修辞对此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并指出对立术语应被用来传达和促进相互依赖和相互关联的关系,且异中互存关系(coexistence-in-difference-in-difference)应该成为研究中国和欧美修辞实践以及运用它们于写作与修辞教学的普遍认识。

简言之,三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组集体的声音:反思美国当今修辞写作研究的新动向,敦促我们挑战写作教学中现有的教学实践,(西方)修辞概念和框架,超越西方修辞传统,学习其他修辞传统并使用来自这些传统的强点和亮点去丰富、提高我们目前关于写作、思考和思维习惯的修辞理论和教学实践。

发展阴阳修辞:从和谐互惠到异中互存

毛履鸣

(犹他大学修辞写作系,美国犹他州)

赵焯冰 译

(美国迈阿密大学英语系,俄亥俄州)

提 要 通过对阴阳修辞的论述并借鉴中国修辞实践的实例,本文重新界定了对立术语(terms of opposites),并对其蕴含的分层极性(hierarchical polarity)和价值判断提出了挑战。本文认为,对立术语应被用来传达和促进相互依赖和相互关联的关系,且异中互存关系(independence-in-difference)应该成为研究中国和欧美修辞实践以及运用它们于写作与修辞课堂中的普遍做法。

关键词 极性 对立术语 阴阳修辞 异中互存

DOI:10.16027/j.cnki.cn31-2043/h.2018.05.004

近些年,在北美、中国讲授中国和欧美修辞传统的过程中,我遇到过很多使用对立术语来描述这两种传统并将它们置于对比或对立的关系中的例子。这些术语包括但不限于:直接与

间接、演绎与归纳、逻辑与类比、存在 (being) 与成为 (becoming)、自言与借言。这样的对立描述本身并非一定有缺陷或存在问题。毕竟,正如比较古典哲学与科学的历史学家劳埃德 (G. E. R. Lloyd) 所言“不管这些术语是否被分为‘正面’和‘负面’两极,对立描述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定义基准 (framework of reference),使各种复杂现象有了被描述或分类的可能性。”(1966: 80) 又或者,如写作学学者彼得·埃尔伯 (Peter Elbow) 长期主张的,矛盾对立可以作为富有成效的而不是阻碍性的启发式方法,如果培育得当,他们可以引导我们“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定义参照体系,将旧参照系中的两个被认为是矛盾的元素都包括进去”(1986: 243)。这两位学者显然认可了对立描述的有用之处。然而,当写作与修辞的教师在使用这些对立术语时,若没有事先全面了解它们的实际含义以及它们实际认可的内容,问题就会出现。例如,成见与二元对立将加剧,而以此为代价的是修辞与文化现象本身的偶然性和复杂性被忽视。同样存在问题的是这些对立术语被随意地用来解释所谓的中国和欧美修辞手法之间的差异。因为这些术语本身需要解释,所以简单地援引它们除了将这种功利性的解释转变为一个循环论证的过程,并不会对不同的修辞实践提供任何有力的新见解。

如果没有批判性地对待这些对立术语,不良后果将产生。比如说,如果不加批判地使用对立术语来描绘或解释中国和欧美修辞之间的差异,其分层极性 (hierarchical polarity) 将凸显。我所谓的分层极性即每对对立描述中的第一方比第二方或“次要 (lesser)”方享有更多价值或特权,且两者的关系总是建立在以一方为主导的普遍理解模式中。当中国的修辞实践或其他修辞实践在缺乏情境化分析 (contextualized analysis) 的条件下被描述为表达或偏好“次要”的沟通模式——间接的、归纳的、类比的或通过别人的声音说话的——物化 (reification)^① 或抽象化 (abstraction) 必然会发生。不论是物化还是抽象化,最终都将导致简化、失实陈述 (misrepresentation) 和/或异域化 (exoticism)。因此,中国修辞很容易成为或被视为欧美修辞的对立面。与此同时,物化也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化与话语现实,从而进一步影响和决定人们随后与中国和欧美修辞实践的交会,导致更多的刻板印象、更多的虚假陈述或扭曲描述,以及更多的异域化,后果是物质性和象征性兼有 (exoticisms with material and symbolic consequences)。

鉴于这些使用对立术语而产生的真实和潜在的问题,我建议重新思考和校准对立术语,以超越此前对其二元化和层级性的理解。为此,我转向中国阴阳修辞。我想借鉴它的动态性来发展对这些对立术语的新理解,并启发在写作和修辞课堂上教授中国和欧美修辞的方法。

阴阳修辞: 显著的异中互存

广义而言,修辞指的是不同的文化利用各自的语言和其他象征手段进行意义创造活动的方式。作为人类,我们使用修辞来劝说、谏言,树立关系和建立秩序,并促使旁人采取行动。修辞所采取的形式也是历史性暂时的和不断翻新的。那么什么是阴阳修辞呢? 写作与修辞学的教师该如何利用它来总体地启迪极性的概念并具体地解读那些特定的对立术语?

阴阳一直被视为中国科学和哲学史上的两大宇宙学概念。公元前四世纪前,阴阳最初指的是山丘或河岸的背光和向阳两侧 (Needham 1956: 227-273)。在公元前三世纪及公元前一世纪之间,阴阳开始有了更广泛的含义,代表“空间或时间进程中任何配置的配对和互补分工”,并作为中心范式用来讨论“主动和被动,生长和衰减,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相互作用”(Lloyd & Sivin 2002: 197)。

根据南森·席文(Nathan Sivin)的说法,阴阳表达了这样一种中心思想“一对对立而互补的存在,向内观察,其现象可逐一被分析,而从外部查看,对两者现象的整体统一认识将形成。”(1987: 63)从这个角度看,阴阳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的。这种关系也具有创造力,因为它总是在自己的时空环境中发展和变化。因此,某种情境下的阴可在另一场合中成为阳,没有任何一方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作为中国相关性宇宙论(correlative cosmology)的一部分,阴阳及其不计其数的表征形成了中国古代各种原始科学的概念构架,包括天文学、医学、音乐、占卜、炼金术和风水学(Raphals 1998: 139)。更重要的是,在被称为战国的一段关键时期(公元前479年—公元前221年),即当中国陷入社会剧变,不同封建势力之间暴力合并,各种学说激烈争夺霸权地位之时,阴阳开始被用来解释并随后用来塑造社会和文化现实。这种动荡不定的环境为阴阳成为一种特色修辞提供了肥沃土壤——这种修辞在宇宙统一的力量之上展现出和谐与互惠,并使当时的统治者找到了他们所期望的用来证明其权威性和合法性的道德和政治依据。它塑造了一种流行新话语,并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其中,个人、国家和宇宙由统治者用天命(Mandate of Heaven)来调解和统一。这是一个以相互依存、和谐和完整性为标志的秩序。

与此同时,古希腊的有关对立的思想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且常被用来与中国古代的阴阳思想进行比较。例如,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考证,毕达哥拉斯对立表(Pythagorean Table of Opposites)即“sustoichia”中有十对相反的术语,每对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了关联式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例如,在有限(limit)方面,有奇数、一、右、男性、静止、笔直、光明、好、正方形。而在无限(unlimited)方面,有偶数、多、左、女性、移动、弯曲、黑暗、坏、长方形。劳埃德(Lloyd)认为亚里士多德应该是借鉴了“sustoichia”的基本思想。他写道“如此(亚里士多德)将右边与男性、正面、上面、热相联系,而相反的,左边与女性、反面、下面、冷相关联,这样的思想在他的宇宙论中于各种情境下作了解释,还被用于他的胚胎学和物理学中。”(1996: 114—115)

然而,对立论在古希腊从来无关道德或政治问题,也从未传达过互惠或和谐的观念。劳埃德(Lloyd)还指出,尽管希腊许多的对立术语对造就了希腊的某些最深层的本体论假设和价值观念,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互惠和相互依赖的”(1996: 121)。因此,“成为(becoming)依赖于存在(being),而不是相反。表象(appearance)取决于现实(reality),但反之不亦然”(1996: 121)。同样,与阴阳修辞在战国时期的使用和发展情况不同,这些关系从来没有被提升为代表或促进政治、道德观念,并为城邦提供一种可使用的连贯性和系统化的概念。古希腊整体的对抗和敌对的环境,以及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威、他们自己的竞争对手和同僚之间的竞争关系使得任何单一的一致统一的对立理论都不可能出现,更不用说一种统一的修辞有可能借力于政治权威或使某种议定的政治制度合法化。

此外,阴阳在根本上扎根于具体的经验,它们指的是特定现象的各个方面,而不是“部分成分,组成力量,或纯粹的抽象”(Sivin 1987: 63)。阴阳及其衍生的阴阳修辞有一个特点值得强调,即一旦它们被从特定的使用场合中抽象出来,或者一旦它们成为抽象的对立符号,阴阳很容易转变成为两个对立成分之间层级性的甚至不可逆转的关系。例如,当女为阴男为阳被特定的实践社群中抽离出来,他们无非会成为本质化或令人难解的特性。如此,会助长类似于“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理念,独尊男性,并强化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支配权。与此同时,若被放在具体的背景下或在相互依存和互惠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女为阴男为阳可被视为两个

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方面或阶段的体现。或者引用宋代(962—1279)著名的哲学家和新儒学思想家朱熹的话“阴阳合一,气亦然。阳退,阴生其中;而非阳退,阴分离之而生……。”(Yin and yang are one and the same qi [energy]. The retreat of yang is the birth of yin; it is not that once yang has retreated, a yin separate from it is born...)(Sivin1992:64)^②

还有一点,当阴阳在其具体处境没有被充分调查的情况下被概括为两极分化的成分或力量,价值判断通常随之而来,进一步加剧它们之间的极性。也就是说,阴以及与之相关的往往被刻板地刻画为邪恶的,或者较弱的。而阳及其相关的则通常被认为是更好的、积极的。这些带有价值判断的关联反过来又加强和促进了现有的权力失衡的社会结构。然而,这样的联想在中国古代公元前三世纪是找不到的。根据尼达姆(Needham)的说法,它们在中国阴阳理论中其实并不存在(1956:277)。

实际上,如果要充分运用阴阳修辞,那么写作与修辞教师就必须考虑或重视空间和时间上任何过程的潜在和活跃阶段,以及它们的连续变化性或相关性。理解这两个阶段是如何运作的,对有效地实践阴阳修辞至关重要。例如,太阳的常规和可预测的每日周期可以用光线在中午达到峰值的阶段和在午夜达到峰值的黑暗阶段来描述。这样做可以让我们看到光与黑暗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不是本质化的极性。同样的道理,在修辞的语境中,直接(direct)若从直接—间接(direct-indirect)的话语关系(discursive relationship)的角度来看待,可代表这个话语关系中积极的阶段;而若间接从直接—间接的话语关系来看待,也可以被视为推动变化的积极阶段。换句话说,直接其实是直接—成为—间接(direct-becoming-indirect),而间接则为间接—成为—直接,以此类推。从这个角度看,对立术语不再指向毫无关联的两个相互对立的元素,而是作为其自身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整体的、不断发展的和相互依赖的话语秩序的一部分。

虽然我想强调阴阳修辞相互作用的核心动力,但并不是在暗指阴阳之间的区分可以或应该马上被消除,或者说,阴阳可以或应该马上被结合起来达到一个稳定无缝的融合。相互依赖并不意味着任何一对对立物之间的差异或分裂的结束,认识和接受差异或分裂也一定不会阻碍相互依存或相互关联的关系。总而言之,构成阴阳修辞的基础应该是对立统一(interdependence-in-difference)的关系,即差异中仍保持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是必须强调的。

发展对立统一关系需要不断培养和探索阴阳或对立术语的平衡点或制衡点。也就是说,写作修辞学的老师必须学会辨别和培育这样一些空间使得两个对立物“时刻为积极的阳(active yang)和感应的阴(responsive yin)之间产生新关系做准备”(Sivin 1987: 69)。开放这些空间使它们能够进一步发挥支撑阴阳修辞的生成性(generative)和变革性(transformative)特征。例如,人们在大自然中经常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即感受到时间周期中的两个分点处的瞬间平衡,白天和黑夜无处不在且它们之间的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中。在修辞实践领域,人们也可以在诸如“用一个类比来说明”或“允许我用归纳推理来说明阴和阳”这样的元话语(metadiscursive phrases)中找到平衡点。使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开辟了一个空间,其中,逻辑和类比、演绎和归纳都处于瞬间平衡状态,随后它们之间将启动一组新的关系。值得认真关注的正是这些元话语时刻(metadiscursive moments),也正是因为它们,我们才有了有效参与和体现对立统一的意义创造机会。

重新定义对立术语：把阴阳修辞运用起来

北美的一些当代修辞学家和信息交流学者最近已将阴阳作为一种修辞形式进行研究。然而，这些研究似乎通常只将阴阳修辞与道德经中的“道”联系在一起。《道德经》这一哲学著作通常被认为是传说中的老子(The Old Master)所写，但它其实最有可能是很多人跨越一段时期共同编纂而成，并最终于公元前4世纪早期或中期(Ames& Hall 2003: 2, 7)完成。例如，最近的一项研究将阴阳称为无法描述的道，将它们形容为代表宇宙的节奏和设计(Combs 2003: 25-26)。另一项研究将阴阳视为《道德经》中最重要的符号，因为这两个互补的元素反映了道的许多不同方面(Kowal 1995: 367)。还有一项研究，为了从修辞的角度研究《道德经》通过悖论(paradoxes)来关注阴阳的动力转换，这些悖论通常包含诸如光明与黑暗、光滑与粗糙、高与低，以及说话与沉默之间的对立或对比(Xiao 2002: 141-143)。

这些研究可能有其自身的价值，但它们大部分都集中在或只关系到《道德经》。同时，超越《道德经》领域的阴阳的修辞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开发。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阴阳修辞在公元前三世纪被发展用来帮助国家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我在此也想探讨阴阳修辞如何有效地被引用来启发我们在写作和修辞课堂中教授中国和欧美修辞手法的异同。特别是，阴阳修辞如何带领我们超越以往对立术语所蕴含和推广的层级分化和极化趋向。

与此同时，还有一种倾向必须加以控制。那就是，发展和运用阴阳修辞的目的决不能被看作是试图使阴阳合理化，或者说用逻辑和因果论证来验证对立统一关系。本研究也不应该被视为将阴阳浪漫化，好似阴阳修辞现已成为解决我们所有挑战的终极要义。更直接地说，任何这样的一种误读都将导致我们把阴阳构建在一个错误的情境中。相反，本研究想要实现的是将阴阳与它们相应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联合起来，从而带出阴阳内在的人性化的因而也是修辞化的维度，使我们能够在特定的情境中去体验阴阳并与之互动，这其中最突出的情境就是我们的写作和修辞课堂。

那么，在写作和修辞课堂上将阴阳修辞付诸实践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这意味着写作与修辞教师通过相互依存和互联互通的关系将对立术语概念化，包括直接和间接、演绎和归纳、逻辑和类比、自言和借言。在这种关系中，一个术语必然依赖于另一个术语，但仍与其他术语保持不同，并且任何一对对立术语中两方的价值都是由它们所连接的交际语境构成的。因此，如果写作与修辞教师选择将某些中国或任何其他修辞传统形容为以间接性或类比思维作特征，他们现在可以提醒学生这种刻画实际上是依赖于直接性和逻辑思维，或以其作为参照点，若没了这些参照点，这些特征将失去其意义或相关性。与此相关的，在写作与修辞课堂中实践阴阳修辞也意味着教会学生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交际语境中，被认为是间接或类比思维的实例可能在另一个交际语境中会被当成是直接或逻辑思维的例子，反之亦然。对任何对立术语的理解都必须被定位于特定的背景和特定的使用场合中，而对对立术语的讨论实则基于对话语定位的背景和功能的考察。

教师可以借助于中国古典修辞实例进行说明。汉代(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汇编的《战国策》从早期的资料(公元前300年—公元前221年)中收集近五百件历史轶事，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说客为了说服统治者采取某些行动所使用的各种劝说技巧。其中一个说服技巧是“双重说服”(doubled persuasion)(Crump 1996: 42)或“矛盾两端论证”

(dilemmatic argument) (Lloyd 1996: 76)。其中一种形式是,说服者在建议某种行动方案时,分别从它的积极和消极两方入手,并展示没有采取积极提议的后果(Lloyd 1996: 76)。这样的技巧在西方修辞学家看来可能太不直接或者说说服力太弱,无法与竞争对手有力争论。但是,如果将这样的交流形式置于整个阴阳修辞语境中,它可能相较于其他的“较不”直接、“较小”说服力的交流形式而言已经算是相当直接且有说服力的了。

在《战国策》中,教师还会看到许多类比论证,这种论证方法可以用来阐明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关系。当使用这些类比例子时,教师可以首先帮助学生在论证中找出不同类型的类比物。这些类比物可以是历史先例、实际或报道的事件集合,也可以是民间故事或寓言,有没有明确的结论都没关系。其次,他们可以专注于具体的例子来说明类比是如何起到修辞功能的。请看下面著名的《狐假虎威》故事:

“我听说北方诸侯都害怕昭奚恤,”楚宣王问群臣,“果真是这样吗?”

除江乙之外,群臣无人回答。他说:“老虎寻找各种野兽吞食它们。抓到了一只狐狸,狐狸对老虎说:‘您不敢吃我,上天派我来做群兽的领袖,您现在如果吃了我,就违背了上天的命令。您如果不信我的话,我在你前面走,您跟在我的后面,看看群兽见了我,有哪一个敢不逃跑的?’老虎信以为真,就和狐狸同行,群兽见了它们,都纷纷逃奔。老虎没意识到群兽是害怕自己才逃奔的,却以为它们是害怕狐狸。”

“现在陛下的国土方圆五千里,大军百万,却由昭奚恤独揽大权。所以,北方诸侯害怕昭奚恤,其实是害怕陛下的军队,这就象群兽害怕老虎一样啊。”(Zhangguoce 1996: 226-227)

在这个例子中,以老虎和狐狸的民间故事作为类比,这位说客通过重新解释谁是恐惧的真正对象来提出令人信服的论点。

学生可能会认为这种情况缺乏(使用)逻辑。这种看法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会严重妨碍他们理解欧美修辞传统上被描述为二元对立术语中的第二个或“较弱”方为特征的修辞传统。其实,只要学生学会超越因果关系视角并关注相似点或差异点之间的相互连系,就能发现这些类比论证实际上是有逻辑的。毕竟,直接性和间接性、逻辑和类比,或任何其他对立术语,都是流动连续体(shifting continuum)上的话语特征。它们的修辞地位——无论是活跃的还是潜在的——取决于它们如何在每个交际情境中与其他参与特征聚合在一起,以及它们如何相对于自己时代的价值精神(ethos)被整体地感知和实践(Mao 2002: 114-116)。因此,类比论证所运用的逻辑不一定要采取因果形式。相反,它可以通过共鸣、失调和其他有赖于情境的话语特征集合体(discursive alliances)的形式来实现。

这种定位给教师和学生带来了两个积极成果。一方面,他们不再需要迷信于直接与间接、逻辑与类比,或任何其他二元对立概念之间的分层级性。通过阴阳修辞的视角,二元对立概念现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变动话语连续体上的话语特征,而构成它们修辞价值的不再是对立而是相互依存,不再是分裂而是共振与失调(resonance and dissonance),不再是等级而是流动性话语特征集合体(shifting alliances)。

另一方面,教师和学生从现在开始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文化价值是如何维持和延续二元论的,并公开和批判性地质疑这些价值观。他们还能认识到,直接性或逻辑思维不过是流动性话语特征集合所组成的连续体上的一种应时功能(emergent feature),又或许只是秩序和变革动态周期中(dynamic cycle of order and transformation)的两个阶段之一。当教师和学生在学习和修辞课堂中使用阴阳修辞时,他们也可以学习制定策略和其他启发式方法(heuristics)来

识别或表达周围的情境,并理解这些对立术语的价值既不固定也不可预测,它们其实是连续体上流动变化的话语特征集合的产物。因此,什么是直接的或间接的,什么是逻辑的或类比的,都不应该是抽象的价值判断,而是通过它们相应的交际环境来判断其意义和修辞功效。

其次,如上所述,阴阳既不代表任何两种特质或属性是对立和抽象的,也不表示这些特质或属性是固定的或难解的。由于阴阳深深植根于特定的使用场合,它们永远不可能彼此分离,也不能与其相应的交际环境分离。因此,如果教师和学生要使用演绎—归纳的极性特征来描绘中国和欧美的修辞实践,那么这种刻画必须基于他们所处的每个具体的话语事件环境。他们还必须明白,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都可以很好地与中国或欧美修辞的任何一方联系起来,尽管可能有一方在某种特定的交际时刻会比另一方更占优势或更具显性存在(importantly present)。

他们可以再次援引中国古典实例。《韩非子》中有一篇关于韩非阐述说服困难的著名篇章。韩非是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的法家代表人之一,他一般采用演绎推理,从概述(声明断言)开始,然后再提供原因和论据。在讨论说服术的成功关键点时,韩非先是做了一个总的阐述“说客须了解说服对象的想法,并且能够投其所好”(1964: 72),然后他继续他的推论,并用他自己的事实论据来支撑他的言论。然而,在提供自身论据的过程中,韩非多次插入了归纳推理,因为这些事例中的某些部分引申出了新的观点或声明。因此,韩非不但通过演绎推理,还通过归纳推理来发展他的论述并对劝说的运作模式提供了一个复杂的分析。套用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对哲学和修辞之间的二元关系的描述,这两种推理方式都不可能“获得完整和持久的优势,因为在任何一方表达胜利的时刻,它都在朝向另一方的方向转化着”(1989: 501)。

同样地,中国修辞实践常被描述为具有通过别人的声音说话并牺牲原创性和权威性的特点。然而,正如阴阳相互依存且两极之间的交替由社会和文化条件决定的原理一样,借言和自言从来不可能被完全分隔开,其中任何一方也永不可能完全退居后台。例如,在传统儒家思想强调仪式、和谐或集体主义的大背景下,我们还是能听到宋代新儒学强烈而生动的中国式个人主义或中国式个性的表达。朱熹的“为自己学习”是表达“儒家个人主义,即肯定自我或个人作为更大的社会整体、生物连续体和道德/精神共同体的动态中心的重要性”的众多例子中的一个(de Barry 1977: 332)。

他们还可以举一个更近的例子来说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民族主义修辞的兴起。文化民族主义修辞旨在恢复本土知识并重建代表着中国话语想象的儒家思想体系,它一方面有效地代替了近来破灭的意识形态(bankrupt ideologies),另一方面取代了各式各样的东方主义。这种新修辞通过本土知识的发声和重新构建的儒家思想确立了其权威性和原创性。与此同时,通过反对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教条,力求摆脱对政治和其他激进意识形态的文化承诺和复兴,它大声而清晰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且明确地传达了自己的独特性。也就是说,它的目的是要合法化和推进新的思维方式和存在,并构成一个独特的中国话语,既适应又促进一个崛起和繁荣的新中国。总而言之,文化民族主义修辞自然而然地渗透进了两种声音:自己的和他人的。

第三,与阴阳一样,直接与间接、演绎与归纳、逻辑与类比以及自言与借言这些对立术语也能够创造出它们自己的平衡时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为一系列新的关系和理解做出贡献。因此,当写作与修辞教师使用这些对立术语来讨论中国和欧美修辞时,他们必须帮助学生寻求和

培养这些平衡时刻,通过否决它们之间不可逆转的对立差异并承认它们的共创能动性(co-constitutive agency)。他们必须帮助学生学会辨别那些话语间隙(discursive interstices)或中间时刻(moments of in-betweenness),以便他们能够真正运用对立统一关系来加深对中国和欧美修辞实践的理解。

例如,他们可以探寻中国的类比思维是如何嵌入或先行于逻辑思维,或者研究欧美自言行为与那些通过借言行为或套用仪式话语的修辞实践有何共通之处。同样,他们还应该进一步探索这些相互依赖的时刻如何变得可能且可取,以及它们如何发挥反作用力来挑战现有的社会和文化范式或期望,并促进或鼓励新的存在、思考和言语方式。例如,在《论语》中,孔子毫不掩饰地告诉他的学生,他想成为儒学传统的传承者而不是创新者(1979: 57)。这种愿望无疑揭示了他对过去的或失去后才被珍惜的传统的深切敬畏和礼仪化关怀。同时,教师和学生不应错过任何机会去探索孔子的这种愿望是如何让他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与传统进行交流,丰富传统,并发展和推进他与传统以及他与门徒之间的新关系。换言之,孔子成功地通过过去的声音(可解读为他者的声音)发表了自己的独特声音。

虽然这些平衡时刻总是不断变化着,但阴阳修辞的确给写作与修辞教师带来了绝佳的机会。它让教师们现在能够运用这些对立术语来教导中国和欧美的修辞实践,并把它们置于对立统一而不是等级和对立的范式中。此外,阴阳修辞能够促使他们实践和推动一种不同的话语秩序,这种新话语秩序既“承认欢迎修辞风格和说服话语的多样性”,又“能够在修辞思维的实践和表述中同时遵从全球普遍价值观和具体文化价值观”(Lu 1998: 308-309)。

结论: 推进自我反思

本文提出的这三点教学思考都还很简短有限。然而,它们确实代表了我对发展阴阳修辞并以此来参与和干预用来描述和解释中国及欧美修辞实践的对立术语所付诸的努力。更确切地说,我转向中国阴阳思想的动力来源于我希望这些术语能够在其自身的语境中,用自己本土的术语来被介绍和评估。我想将阴阳修辞和直接与间接、演绎与归纳、逻辑与类比、自言与借言等对立术语联系起来,并试图用阴阳和它们所传达的思想内涵来重新构建这些术语,以便写作与修辞教师能够帮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和欧美修辞传统,并且让他们能够开始养成一个不以层级性和极性为标志的,却重视共鸣和相互依赖关系的话语习惯。如此,我希望能对有关比较修辞以及中国和欧美修辞实践的讨论做出些许贡献。这些努力还将帮助形成“共同的纽带和认同感,这是凝聚社会或文化的粘合剂,也是帮助人们实现愿望和梦想的基础”(Zarefsky 2006: 386)。

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还意识到这篇以阴阳修辞为主题的文章同时也启发了我自身的研究方法,引导我避免用极化词汇来描述和评估中国和欧美美学修辞实践,而是去发展一个新的方式来讨论和教授它们。这样的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我约束自身将两种修辞传统本质化的冲动,还为我们这些写作与修辞教师提供一种反思自身教学实践的批判性思维启示。也就是说,当教授太平洋任何一岸的学生时,我们现在可以使用阴阳修辞来对我们自己的教育事业以及给学生的写作阅读实践的反馈进行元评论(meta-commentary)。例如,我们可以问自己:我的教学是否受到阴阳修辞的指导和启迪?它在何种程度上被定于自己的本土语境中进行谈论?我对它的解读又在何种程度上受到我自身所处的环境和持有的主观立场所影响?我的教

学实践能否容许我自己开发新的交流探讨术语或概念(terms of engagement)并思考新的关系和见解?我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带领学生理解他们所熟悉的(可理解为那些旧的对立术语)和陌生的(可解读为那些新兴的探讨术语)术语?如何让他们所熟知的变为陌生的,而让陌生的变为熟知的?或者更理想地,如何把陌生—熟悉的关系从对立转变为相互依存?举些具体例子,我们怎样才能让(我们较熟知的)孔子和他的《论语》或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论修辞》变得更加陌生?又该怎样使(我们较陌生的)中国古代的政见文(policy essays)或古代近东的女性哀歌(lamentations)变得更加熟悉?再者,我们要如何让八股文或演讲文(epideictic speech)变得陌生,而让中国当代作品变得更为人所熟知?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将课堂内外所涉及的讨论内容提升到更高且更有活力的水平上,使学生可以通过对立统一关系来全新地了解中国和欧美的修辞实践,并使塑造自我与他人之间共同纽带的前景变得更加明朗和迫切。

作者简介

毛履鸣(Mao Luming) 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英语博士,现为美国犹他大学修辞写作系主任、教授。原为美国迈阿密大学英语系主任、教授。主要从事西方修辞、中西比较修辞、批评语言学以及英语写作教学与研究。出版专著、编著七部;在美国修辞学核心期刊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和 Rhetoric Review, 现代英语文学语言研究核心期刊 PMLA, 国际语用学核心期刊 Journal of Pragmatics, 大学英语修辞写作核心期刊 College English 和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JAC, 语言文学期刊 Style 等刊物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注 释

- ① 物化是使抽象的想法或概念具体化或真实化。
- ② 中文词“气”有很多英文译文,包括“能量”“以太”“蒸气”,甚至是“呼吸”。Sivin 定义了气或其在中国约公元前 350 年的有关自然的描绘中的使用为“既是‘事物中促成事情发生的物质(what makes things happen in stuff)’又是(取决于上下文)‘促成事情发生的物质(stuff that makes things happen)’或是‘发生事情的物质’(stuff in which things happen)’”(47)。欲了解更多关于气的丰富含义,请参阅 Sivin(46-53) 以及 Qu。

参考文献

- Ames, Roger T., & David L. Hall 2003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Daodejing “Making This Life Significant:”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Trans. Roger T. Ames and David L. Hall. New York: Ballantine, 1-10.
- Combs, Steven C. 2005 *The Dao of Rhetoric*. Albany: SUNY P.
- Confucius 1979 *The Analects*. Trans. D. C. Lau. Hong Kong: The Chinese UP.
- Crump, J. I. 1996 “Introduction.” *Zhanguo [Chan-kuo Ts’ e]*. Trans. J. I. Crump. Rev. ed.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 of Michigan, 27-53.
- Daodejing “Making This Life Significant:”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Trans. Roger T. Ames and David L. Hall. New York: Ballantine.
- de Barry, Wm. Theodore 1977 “Neo-Confucian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Studies in Confucian and Taoist Values*. Ed. Donald J. Munro.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331-58.
- Elbow, Peter 1986 *Embracing Contraries: Explorations in Learning and Teaching*. New York: Oxford UP.
- Fish, Stanley 1989 “Rhetoric.” *Doing What Comes Naturally: Change, Rhetoric, and the Practice of Theory in Literary and Legal Studies*. Stanley Fish. Durham: Duke UP, 471-502.
- Han Feizi [Han Fei Tzu]: Basic Writings*. 1964 Trans. Burton Watson. New York: Columbia UP.
- Kowal, Kristopher 1995 “Reading Lao-tzu as Rhetoric.” *Rhetoric: Concepts, Definitions, Boundaries*. Ed. William A. Covino and David A. Jolliffe. Boston: Allyn, 364-73.

- Lloyd ,G. E. R. 1996 *Polarity and Analog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P.
- Lloyd ,G. E. R. 1996 *Adversaries and Authorities: Investigations into Ancient Greek and Chinese Scien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P.
- Lloyd ,Geoffrey ,& Nathan Sivin 2002 *The Way and the Word: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Early China and Greece*. New Haven: Yale UP.
- Lu ,Xing 1998 *Rhetoric in Ancient China ,Fifth to Third Century B. C. E.: A Comparison with Classical Greek Rhetoric*. Columbia: U of South Carolina.
- Mao ,Luming 2002 Re-clustering Traditional Academic Discourse: Alternating with Confucian Discourse. *ALT DIS: Alternative Discourses and the Academy*. Ed. Christopher Schroeder ,Helen Fox , and Patricia Bizzell. Portsmouth ,NH: Boynton/Cook ,112-25.
- Needham ,Joseph 1956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2 of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7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 Qu ,Weiguo 2009 The *Qi* rhetoric of persuasion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60.4: W76-W85. Web.
- Raphals ,Lisa 1998 *Sharing the Light: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and Virtue in Early China*. Albany: SUNY P.
- Sivin ,Nathan 1987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Partial Translation of Revised Outline of Chinese Medicine (1972) with an Introductory Study on Change in Present-day and Early Medicine*.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 Xiao ,Xiaosui 2002 The rhetor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on the Dao in *Daode j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XI-1: 137-151.
- Zarefsky ,David 2006 Reflections on rhetorical criticism. *Rhetoric Review* ,25.4: 383-87.
- Zhanguo*ce [*Chan-kuo Ts' e*] 1996 Trans. J. I. Crump. Rev. ed.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 of Michigan.
- Zhu ,Xi 1992 *Notes on The Analects*. Jinan ,China: Qiru P.

Developing Yin-Yang Rhetoric: From Harmony and Reciprocity to Coexistence-in-Difference

Mao Luming

Abstract: By turning to yin-yang rhetoric , and by drawing on examples from Chinese rhetorical practices , this essay reconfigures terms of opposites and challenges their imbedded hierarchical polarity and value judgments. It argues that terms of opposites should be constructed as conveying and promoting a relationship of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connectivity and that interdependence-in-difference should serve as the prevailing modus operandi for studying Chinese and Euro-American rhetorical practices and for engaging them in the writing and rhetoric classrooms.

Keywords: polarity , terms of opposites , yin-yang rhetoric , independence-in-difference